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413-42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88

Hans汉斯

阐释学视域下乡土语言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以葛浩文《蛙》英译本为例

李滢乐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4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8日

摘　要

乡土语言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核心载体，而乡土语言的翻译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本文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的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四阶段为理论框架，以葛浩文《蛙》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的典型乡土语言实例，探究译者在乡土语言翻译各阶段中的主体性呈现机制。研究发现，葛浩文在《蛙》中的乡土语言翻译过程中，以深度的文本阐释为基础，充分调动自身的译者主体性以实现源语乡土文化内涵与文本功能的有效传递。研究为乡土文学对外译介中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发挥提供了实践参考，也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有效对外译介提供了可参考的翻译路径。

关键词

阐释学，译者主体性，乡土语言翻译，《蛙》，葛浩文

Analysi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Frog*

Yingle L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October 14, 2026; accepted: November 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8, 2026

文章引用: 李滢乐. 阐释学视域下乡土语言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413-422.
DOI: 10.12677/ml.2026.14111088

Abstract

Folk language is the core vehicle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such languag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adopts George Steiner's four-stage hermeneutic translation theory, *i.e.* trust, aggression, incorporation, and restitution,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aking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rog* as the subject of study, it selects typical examples of folk language from the tex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manifests at each stage of translating folk language.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ranslating the folk language in *Frog*, Howard Goldblatt, grounded in in-depth textual interpretation, fully mobilized his subjectivity as a translator to effectively convey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extual function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on the appropriate exercise of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s well as a referenceable translation pathway for th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Keywords

Hermeneutics,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of Folk Language, *Frog*, Howard Goldblat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乡土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独特的地域风情与民间智慧。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根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泥土之中，作品中充满了独特的民间叙事和浓郁的乡土语言。长篇小说《蛙》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聚焦中国近六十年农村生育史，通过对姑姑万心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刻画，探讨了生命、伦理与赎罪等深层课题。书中大量运用具有地方特色的俚语、歇后语、民俗词汇及独特的称谓，这些乡土语言承载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展示了中国社会变迁与民间伦理。乡土语言翻译是乡土文学走向世界的桥梁。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权威译者，其译本在西方文学界享有盛誉。由葛浩文执笔的《蛙》英译本(*Frog*)生动地还原了莫言笔下的高密故事，深受海外评界赞誉。

目前，学界对葛浩文译莫言作品的研究已积累丰富成果，多集中于翻译策略、文体比较等宏观层面，虽然已有学者关注译者主体性，但从阐释学视角出发，聚焦“乡土语言”这一微观维度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仍有待深化。阐释学探究理解，它与翻译学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对等转换，而是译者基于自身认知与文化背景，对原文文本及背后深层意义进行主动解读、阐释与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这也使得阐释学能够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坚实的支撑。乡土语言是承载地域文化、民间智慧与民族基因的载体，乡土语言翻译的本质就是译者对原文文化内涵的主动阐释过程。因此，本文基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选取葛浩文英译本《蛙》中的典型乡土语言实例，分析译者在处理乡土语言时如何通过阐释展现其能动性与创造性，期望能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有益的参考与个案借鉴。

2. 葛浩文翻译研究与阐释学、乡土语言翻译

阐释学关注的是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为分析译者如何理解原文、为何做出特定翻译决策提供了扎实

的学理支撑。在众多阐释学翻译理论中，乔治·斯坦纳的“信赖、侵入、吸收、补偿”翻译四步骤理论影响尤为广泛。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译者不断理解、判断与重构的阐释过程，翻译行为始终体现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理论为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理解、判断与决策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目前已有诸多研究依托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理论，对不同译者、不同文本类型的译者主体性展开分析，验证了该理论的普适性与解释力。如刘畅以程乃珊《喜福会》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对照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个翻译环节，分析了译者在文本选择、文化解读、策略取舍与信息补全过程中的主体性表现[1]。张婧、刘兵考察了典籍译本《孙子兵法》，明确了译者主体行为在阐释学四阶段对译文生成的直接影响，丰富了阐释学视角下典籍翻译的主体性研究[2]。叶晗修以马尔兄弟《聊斋志异》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依托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理论分析文本内宗教文化负载词的译法，表明译者受知识基础与时代条件制约会形成不同文本解读，为古典文言小说的译文评价提供新路径[3]。也有研究运用斯坦纳四步骤理论分析葛浩文的英译作品，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译本为个案，探讨葛浩文在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中如何发挥主体性[4]-[6]。相较于关注译者的翻译策略、描写译者的译文风格，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将分析重心放到了译者本身，能够跳出文本表象，挖掘译文特征背后译者的内在选择和决策。

然而，现有研究对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讨论多围绕作品整体展开，较少聚焦于某一特定语言类型的翻译场景。乡土语言是莫言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近年来，莫言作品的乡土语言翻译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从“求真”“务实”角度考察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中乡土语言的翻译实践[7]；也有研究从翻译模因论、改写理论等视角探讨葛浩文译笔下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8] [9]。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陈兆瑞等从体认翻译学视角解读了《蛙》中乡土语言的英译认知机制[10]；有学者以《生死疲劳》为对象，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其中乡土语言的翻译策略[11]。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葛浩文乡土语言的翻译实践，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路径，但多数讨论仍以翻译方法与效果的描述为主。乡土语言的翻译是译者结合自身认知与文化视野完成意义阐释与文本重构的动态过程。阐释学研究的正是“理解如何发生”这一基本问题，能够为分析译者如何解读乡土语言中的文化信息、为何做出特定的翻译决策提供可行的分析路径。乡土语言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载体，其独特的方言俚语、俗语文化往往承载着深厚的地域记忆与情感共鸣，也是翻译实践中难以跨越的文化鸿沟。基于此，本研究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出发，考察葛浩文在《蛙》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尝试归纳其在不同阶段所采用的译介策略，以期为中国乡土语言的翻译实践提供可借鉴的参考，从而推动具有鲜明中国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学更真实、立体地走向世界舞台，提升中国乡土文学在国际语境中的感召力与传播深度。

3. 阐释学与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词源可追溯至古希腊语中的“Hermes”，原指神话中传递神谕的使者，负责将晦涩的神圣旨意转化为人类可理解的语言，其本质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哲学探索。这一理论历经漫长的发展演进，从最初对经典文本的语文学诠释，逐步发展为涵盖哲学、语言学、文学等多领域的系统性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研究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译者的角色也因此从传统观念中隐形的仆人，逐渐走向显形的决策者与文化协调者。在此背景下，“译者主体性”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贯穿于从文本选择、意义解读到语言重构、文化协商的整个翻译过程。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打破了将译者视为被动传声筒的传统观念，承认译者是具有独立判断、文化立场与审美偏好的积极主体，译者和作者是平等对话的关系[12]。乔治·斯坦纳率先将阐释学理论系统应用于翻译研究，将翻译视为一种贯穿人类交际活动的基本阐释行为。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中，他论述了阐释学翻译四步骤，即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为研究译者主体性提供了系统框架，论证了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一种充满能动性的阐释运动。

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是受文本特性、文化语境等多重因素制约的理性能动性。在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中，信赖是翻译活动的逻辑起点。信赖指译者在翻译之初对原文文本价值的预设与认同。信赖是基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判断与社会语境形成的理性认知。这意味着译者相信原文承载着值得传递的意义与价值，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信赖展现了译者的主体性选择。侵入是译者主动深入原文文本的阐释过程。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带着自身的语言系统、文化背景、认知前见介入原文，对文本意义进行挖掘与重构。而由于译者与作者之间存在时空、文化与个体经验的差异，译者更需要在尊重文本的前提下，深入挖掘文本的显性意义与隐性内涵，实现对原文深层意义的把握。吸收是译者将源文本的意义与形式转化为目标语表达的过程，是翻译的核心实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会在目标语文化框架内对源文本元素的整合与重构。此时译者需自主决策异化与归化的程度、语言形式的调整方式，在保留文化特色与确保读者理解之间寻求平衡。补偿旨在弥补前三个步骤中出现的意义损失或平衡失衡。由于语言结构、文化差异与认知差异的客观存在，翻译中的意义损耗难以避免，因而译者有必要运用补偿策略来实现翻译的完整性。补偿不是随意增补，而是基于原文意义与语境的理性调整，通过解释性翻译、文化注释、意象转换、语义显化等方式，修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信息缺口，重建源文本与译文之间的平衡。

4. 乡土语言翻译与译者主体性

乡土语言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核心表意载体，是特定地域民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口耳相传的语言形态，涵盖方言俚语、谚语歇后语、民俗专属词汇、乡土称谓、器物名称及社会制度相关表达等多元类型[13]。乡土语言的本质是地域文化的语言具象化呈现，承载着特定区域的风土人情、民俗传统、思维范式与价值观念，是乡土文学“土味”与“俗韵”的核心来源[10]，更是彰显中华文化独特性的重要符号。

从文化维度来看，乡土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依附性。乡土语言的形成与特定地域的生产方式、民俗传统、思维范式高度相关。许多乡土表达背后蕴含着中国乡土独特的生活经验与文化逻辑，还与民间信仰、传统习俗紧密交织，如“送子娘娘”“活菩萨”等词汇便暗含中国民间对生育的祈愿文化。在乡土语言中，涉及地方民俗的词汇往往与特定仪式、信仰相关，其语义无法脱离具体文化语境而独立存在；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制度的表达，承载着鲜明的历史记忆，对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而言，直接翻译难以传递其制度内涵与时代语境。乡土语言的文化关联性使得译者在传递核心语义的同时，难以完整还原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容易造成文化信息的损耗或误解。从语言维度分析，一方面，乡土语言具有强烈的口语化与通俗性，多为民众日常交流的自然表达，句式灵活、语气鲜活，部分表达甚至缺乏固定的书面规范，在转换为英语时，容易失去原有的生活质感，或因过度规整而显得生硬；另一方面，乡土语言常依赖具象化意象传递深层意义，这些意象的文化指向性极强，在西方文化中可能缺乏对应的联想基础，直译易导致语义失联，意译又可能消解原有的形象感与感染力。此外，乡土语言中的方言词汇、歇后语、俗语等，其韵律美、对称美或幽默讽刺效果往往与特定语言形式紧密相关，跨语言转换中难以实现功能对等传递。从功能维度而言，乡土语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在塑造人物形象、渲染乡土氛围、承载情感态度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翻译中若仅注重语义的准确传递，可能会丢失其在文本中的情感功能与风格功能；若过度追求风格再现，又可能影响译文的可读性。例如，乡土语言中的粗俗语或方言称谓，既体现了人物的身份背景与性格特征，又蕴含着特定的情感倾向，翻译时需在“忠实原文风格”与“避免目标语读者不适”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功能的多重性使得翻译策略的选择面临两难。

乡土语言的以上特性决定了乡土语言的翻译不能依靠固定的规则或机械的转换。译者是连接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中介。面对乡土语言的文化特性，译者能够通过自身的文化认知与判断，挖掘乡土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自主决策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与转换方式。若无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乡土语言极易沦为失去文化灵魂的字面翻译。在乡土语言的形式特点上，译者能够凭借自身的双语语言功底在目标语中创造性地寻求对应或补偿性表达，从而在转换中尽力保留原文的生动性、节奏感与修辞效果，使俗语不落于生硬，土味不流于晦涩。就乡土语言的多重功能诉求而言，译者能够基于文本语境与传播目的，自主判断不同语境下乡土语言的核心功能，进而调整翻译策略，从而实现文本整体意义的完整传递的核心。由此来看，乡土语言的翻译过程也是译者通过主体性介入实现的文化转译与意义重构过程。

5. 《蛙》乡土语言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可挖掘性

《蛙》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品，其中的乡土语言具有高度代表性与研究价值，既展示了前文所阐释的乡土语言的多元特性，也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实际的运用场景。从文本本身来看，《蛙》以山东高密东北乡为叙事背景，全文充斥着大量具有浓郁齐鲁乡土气息的语言表达，涵盖高密方言俚语、民俗专属词汇、乡土称谓、民间谚语及与乡土社会生育制度、民俗仪式相关的独特表达，这些乡土语言不仅是塑造“姑姑”等乡土人物形象、渲染东北乡乡土氛围的核心载体，更承载着中国乡土社会的生育文化、民俗传统与价值观念，是乡土语言与文本内容、文化内涵深度融合的范本。从翻译实践来看，《蛙》中乡土语言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促使葛浩文充分调动自身的主体性，在深入阐释乡土语言深层文化内涵与文本功能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翻译策略、平衡文化传真与西方读者的接受度。换言之，葛浩文的翻译实践能够清晰展现译者主体性在乡土语言翻译中的具体运作过程与呈现形态。此外，《蛙》的英译本(*Frog*)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的传播度与影响力，这意味着葛浩文的翻译实践不仅在微观层面完成了语言转换，更在宏观层面成功实现了乡土语言的跨文化传播。分析该译本中乡土语言的处理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译者主体性在乡土语言翻译中的作用机制，同时为同类乡土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参考，推动中国乡土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6. 《蛙》中乡土语言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6.1. 信赖

在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中，信赖是译者基于自身的文化认知、学术积淀、审美偏好，对源语文本的文学价值、文化内涵与翻译可行性形成的主动判断、价值认同与情感接纳。这种信赖直接决定了译者翻译动机的强弱、翻译投入的程度，也影响着后续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实施。

葛浩文和莫言之间存在着长期、深入且相互滋养的文学合作关系。这种合作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转译，形成了一种基于相互欣赏与信任的文学共鸣。葛浩文曾提到，他选择翻译的文本时，会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并且他认为莫言的作品不会不好[14]。莫言那种劲健、天马行空、高度形象化的文学风格深深地吸引着葛浩文[15]。在《蛙》中，这种风格极大程度上体现为大量生动、粗粝而又意蕴丰富的乡土语言的运用。从充满胶东风情的方言俚语到承载民间智慧的俗语谚语，这些乡土表达既是莫言的风格标识，也激发了葛浩文翻译创造力、赢得了其深度的信赖。换言之，葛浩文对《蛙》的信赖，在起点上就包含了对其中乡土语言所承载的文学性与风格价值的充分肯定。

译者自身的学术积淀与实践经验也是信赖形成的重要支撑。葛浩文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一直深耕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了大量乡土文学作品，积累了处理各类乡土表达的丰富经验。葛浩文具有深厚的汉学素养与跨文化翻译经验，这也给了他对自身阐释能力的自信，使其在面对《蛙》中文化缺省明显、表达形式独特的乡土语言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探索既忠实于原文乡土特质、又符合英

语读者接受习惯的翻译路径，尽量避免因翻译难度而造成的文化内涵损耗，从而在信赖阶段就为后续的翻译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葛浩文对《蛙》及其中的乡土语言有着建立在文学认同与翻译能力基础上的信赖，这使得他能够怀着理解与共情的心态进入文本中的乡土世界。

6.2. 侵入

翻译中的侵入本质上是译者打破源语文本的语言与文化外壳，主动介入文本阐释、挖掘深层语义与文化内涵，并结合目标语语境与读者接受习惯进行创造性重构的过程。不同于信赖阶段的价值认同与情感接纳，侵入阶段的译者是主动的阐释者与改造者。由于中西方语言体系、文化背景、思维范式的本质差异，《蛙》中具有浓郁齐鲁乡土气息的语言表达，必然会对葛浩文的翻译形成天然阻碍，此时便需要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以主动侵入的方式突破阻碍，在语义传递、文化还原与读者接受之间寻求平衡。葛浩文在《蛙》乡土语言翻译中的侵入，始终围绕尽量忠实于原文核心内涵、适配西方读者认知的原则展开。比如：

例 1 二尾子

原文：你这个臭娘们，你们都是生不出孩子的“二尾子”，你们自己不会生，所以才不让别人生，你们自己生不出，才想把别人的孩子霸为己有[16]!

葛译：You stinking hermaphrodites can’t have kids of your own, so you won’t let other people have theirs. When they do, you take them for your own [17]!

方言俚语是乡土语言最具地域性的表现形式。《蛙》中大量高密方言的运用，既是塑造人物性格、渲染乡土氛围的关键，也是翻译的重点与难点。葛浩文聚焦方言俚语中的核心情感与形象传递，弱化地域方言的表层差异。“二尾子”作为山东高密地区典型的方言俚语，本义指生理性别模糊或性格偏向异性的人，在原文语境中，是争执双方带有强烈贬义与辱骂意味的表达，承载着激烈的愤怒与嘲讽情绪。葛浩文在翻译时选用了生物学词汇“hermaphrodites”，只保留“不符合传统性别与生育认知、无法实现生育功能的人”的核心语义，这种翻译行为虽然剥离了原词的方言韵味，使得译文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原文强烈的辱骂语气与情感冲突，但也突破了方言表层形式的束缚，又实现了语义核心内涵的对等传递。

例 2 沾亲三分向

原文：田桂花是吕牙的远房婶子，沾亲三分向，吕牙就说：万心，你一个年轻姑娘，打一个老人，不感到臊得慌吗[16]?

葛译：Tian Guihua was a distant aunt of Lu Ya, close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family. Wan Xin, he said to Gugu, aren’t you ashamed to hit an old woman [17]?

乡土谚语是乡土民众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承载着独特的乡土思维与文化逻辑。《蛙》中“沾亲三分向”便是典型的乡土谚语，核心语义是“只要有亲戚关系，就会在态度上偏向自己人”，体现了中国乡土社会人情本位的人际关系逻辑与亲属观念，原文语境中用于劝说姑姑万心不要殴打长辈，因对方是自己的远房亲戚，暗含“看在亲戚面子上手下留情”的意味。葛浩文省略了“沾亲”的字面表达与“三分向”的模糊化数量隐喻，只抓住“有亲戚关系、会偏向自己人”的语义，用“close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family”这一表达将中国乡土社会的“远房亲戚”概念转化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的“可被视为家人的亲近关系”。“沾亲”“三分向”均是极具中国乡土特色的表达，葛浩文的翻译虽然部分丢失了“沾亲”所体现的乡土社会亲属关系的松散性与广泛性，也未能完全传递“三分向”这一模糊化的情感倾向表达，但西方文化中本就缺乏中国文化对应的亲属观念与表达习惯，西方读者也很难完全准确理解“三分”的具

体含义，难以体会其中的人情逻辑。在译文中，葛浩文通过调整对话句式，将原文“沾亲三分向”作为劝说的前提，自然融入上下文语境，可见其在确保语义传递的连贯性与可读性上的努力。

综上，葛浩文在《蛙》乡土语言翻译中始终以主动阐释者的姿态介入文本，虽然原文和译文在核心语义、情感内涵与乡土特质上仍存在一些差距，但葛浩文能够理性地考量目标语语境与读者接受习惯，以适度侵入的方式突破语言与文化障碍，充分体现了其阐释乡土文化内涵与语境功能的主体性。

6.3. 吸收

如果说侵入是译者主动进入源语文本，打破语言与文化的壁垒，那么吸收则是译者将所获取的意义素材进行消化、重塑，并融入目标语表达框架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对翻译策略的精心选择、对意象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的把握上。由于中西方语言体系、文化背景、思维范式的本质差异，《蛙》中承载独特民俗内涵与乡土逻辑的语言表达，在融入英语语境时必然会面临适配难题，此时便需要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采用灵活的策略在语义忠实、文化保留与读者接受之间寻求平衡。

例 3 送子娘娘

原文：那时候，我是活菩萨，我是送子娘娘[16]。

葛译：I was a living Buddha back then, the local stork [17].

乡土语言中常包含具有浓厚民间信仰色彩的意象，这些意象在源语文化中承载着特定的象征意义与情感内涵，在英语语境中往往难以引发对应联想。“活菩萨”与“送子娘娘”均属于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人格化神祇意象，前者喻指慈悲为怀、救苦救难之人，后者则是专司生育的民俗信仰对象。在原文中，二者连用，意在凸显叙述者“姑姑”作为计划生育干部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近似于“神明”的角色。对此，葛浩文展现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对于“活菩萨”，他采用了异化色彩较浓的“living Buddha”。“Buddha”在西方语境中已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并且该词能直观地保留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使西方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姑姑”当年在乡民心中近乎神格化的地位。然而，在处理“送子娘娘”时，葛浩文则放弃了直译，转而寻求西方文化中的形象补偿，体现了归化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他将“送子娘娘”翻译为“the local stork”，即当地的鹳鸟。在西方民间传说中，鹳鸟是衔送婴儿入户的神鸟，这一意象与中国语境中主管生育的“娘娘”在功能上重合。葛浩文成功通过这种文化意向的嫁接消解了西方读者对“娘娘”这一称谓的认知隔阂，将中国乡土中复杂的生育崇拜逻辑传递到了西方读者的认知内。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中国本土神祇的具体形象，却传递了深层的文化意义，降低了西方读者的理解成本。

例 4 狐死首丘，落叶归根

原文：早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正是，狐死首丘，落叶归根嘛[16]。

葛译：I heard you were back...That’s right, I said. A fox dies in the den where it was born, a leaf falls to the ground right below [17].

要翻译结构对称工整、意象鲜明且寓意深远的乡土谚语，译者不仅需要准确理解其字面与引申义，还需在目标语中重构其形式美感与文化逻辑。“狐死首丘，落叶归根”是一组极具汉语诗性特征的谚语，通过狐狸头朝巢穴死去、树叶落回树根两个自然意象，深刻喻指人对故乡的眷恋与生命最终的归宿。在英语语境中，表达“归乡”或“终老故乡”通常有现成的归化表达，如“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或“Return to one’s roots”。但葛浩文在翻译这一谚语时，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与表达形式，让目标语读者感受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他采取异化策略，完整保留了“狐”“丘”“叶”“根”全部核心意象，

最大限度保留了汉语谚语的文化本色，让西方读者通过“狐狸归巢”“落叶归根”这两个极具中国乡土特色的意象，理解中国人“安土重迁”“眷恋故乡”的文化内涵。同时，原文“首丘”与“归根”是动宾结构，葛浩文通过添加关系从句“where it was born”和方位短语“right below”，明确了“丘”与“根”的具体所指及其与动作的逻辑关系，将汉语的意合转化为英语的形合，使逻辑关系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在异化之外，葛浩文也通过必要的归化手段，对语言形式进行了适应性改造，以确保译文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葛浩文在翻译《蛙》中乡土语言的“吸收”阶段，展现出了译者在翻译中的策略选择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在乡土语言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既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概念替代中国表达，也不能生硬地保留所有文化细节，而需要根据每个表达的特点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在读者对译文的可理解性和文化特色的保留之间找到平衡点。

6.4. 补偿

译者在侵入与吸收阶段的创造性阐释与策略取舍，必然会导致源语文本的文化本色、语言韵味或深层内涵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这种流失既可能源于中西方语言逻辑的本质差异，也可能来自文化背景的认知隔阂，进而打破译者与源语文本最初建立的信赖关系，使译文读者难以完整领略原文。此时，补偿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译者需充分发挥主体性，结合文本语境与传播目的，采用恰当的补偿策略，对翻译过程中丢失的信息、弱化的内涵进行补充与修复，确保原文的文化价值与文本功能得到尽量完整和精准的传递。葛浩文在《蛙》的乡土语言翻译中，针对不同类型的乡土表达，灵活运用了解释性增译、语义补充等补偿策略来补充意义。

例 5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原文：否则，她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16]。

葛译：Without it, she could not have recaptured her good name even if she’d jumped into the cleansing waters of the Yellow River [17].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属于极具乡土特色的情感表达。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以水色浑浊为显著特征，民众基于这一自然属性，衍生出“黄河水浑浊，即便跳进其中也无法洗净污秽”的逻辑，进而延伸为“冤屈难以洗刷”的语义。人物并非真的想要通过跳河这一行为实现物理清洁，而是试图以极端方式证明自身名誉清白，摆脱不白之冤。在翻译时，葛浩文增补了“recaptured her good name”，将“洗不清”的抽象内涵转化为西方读者易于理解的“名誉挽回”，使译入语读者能快速领会该隐喻的真实指向。与此同时，西方读者对黄河的自然特质、文化象征意义并不了解，在西方文化中，黄河与“洗涤”“清白证明”的逻辑关联更是无从谈起。为此，葛浩文巧妙地为“Yellow River”添加了“cleansing waters”这一含义。如此一来，即便西方读者不了解黄河，也能通过“具有净化功能的水域”这一设定，理解“跳河”与“证明清白”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体会人物“即便借助极致的净化方式，也无法挽回自身名誉”的绝望与无奈，使译文在情感冲击力上与原文达成了平衡。

例 6 一丈六尺五寸布票

原文：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16]。

葛译：When the “weet potato kids” were born, the household heads could register them with the commune and receive coupons for sixteen and a half feet of cotton and two jin of soybean oil [17].

“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制度与民生特色。中国传统长度单位“丈、尺、寸”与西方长度单位英尺、英寸的换算存在差异，西方读者无法准

确感知原文中布票的实际数量。同时，“布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专属物品，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西方社会中并无对应的概念，这导致西方读者无法理解其功能与意义，难以体会其中蕴含的时代背景与民生状况。对此，在翻译“一丈六尺五寸布票”时，葛浩文将其阐释性地译为“coupons for sixteen and a half feet of cotton”。葛浩文首先将中国传统长度单位“一丈六尺五寸”换算为西方读者熟悉的“sixteen and a half feet”，让西方读者能够直观感知布票对应的棉布实际长度，弥补了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长度单位认知的缺失，避免了因单位陌生导致的语义误解。同时，葛浩文通过增补“cotton”，显性化“布票”用于兑换棉布的功能，使目标语读者能理解其作为“物资配给凭证”的性质，而“coupons”一词也贴合了西方社会对配给券的认知。

由此可见，葛浩文在翻译《蛙》中的乡土语言时，注重拉近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化解中西方语言逻辑、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阻碍，让《蛙》中乡土语言的文化本色、语言韵味与深层内涵得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与传递，使西方读者能够完整领略中国乡土语言的独特魅力。

7. 结语

本论文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的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四阶段为理论框架，以葛浩文《蛙》英译本中的乡土语言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译者在乡土语言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呈现机制。研究发现，乡土语言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核心表意载体，兼具地域文化依附性、语言表达独特性与文本功能多重性，乡土语言的跨文化翻译无法依靠机械的语言转换，而需要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在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原文忠实与读者接受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乡土语言的对外译介中，译者应在信任阶段建立起对源语乡土文本文学价值与文化功能的理性认同。乡土语言虽包含大量粗粝的方言、俚语及俚俗称谓，但译者需具备跨文化阐释的自信，将其视为作品的审美特色与文化内核，不因表达形式的不对称或翻译难度而轻易删减或平淡化处理。在侵入阶段，面对高度依附于特定地域与语境的方言俚语及民间俗语，译者需主动深入文本内涵，抓取其核心语义与语气功能，以准确、顺畅地传递乡土语言的深层意义。在吸收阶段，译者应根据乡土语言的具体类型采取差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富含民族特色意象的词汇，可借助目标语文化中具有相似功能的意象进行归化转化或意象补偿；对于具有高度汉语诗性与对称结构的乡土谚语，则宜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其核心意象与文化本色。最后，在补偿阶段，面对涉及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深层俗语逻辑导致的语义损耗，译者需善用解释性增译与语义显化等手段将隐含的制度功能或文化象征意义显性化，从而修复信息缺口，弥补文化隔阂导致的理解偏差，实现译文与原文在文本功能与文化价值上的对等。

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充分印证了在乡土语言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翻译选择是基于对源语文本的深度阐释、对目标语读者认知习惯的理性考量，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乡土语言文化价值与文本功能的完整传递。乡土文学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而乡土语言则是乡土文学传播的桥梁。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背景下，中国乡土文学的对外译介，需要更多译者像葛浩文一样，以深厚的文化素养为根基，以充分的译者主体性为支撑，深入挖掘乡土语言的文化内涵，灵活运用阐释与翻译策略，化解中西方的语言与文化差异。唯有如此，才能让承载着中国地域风情、民间智慧与民族基因的乡土语言被更多世界读者理解与感知，让中国乡土文学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桥梁。

参考文献

[1] 刘畅. 阐释学理论视野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J]. 上海翻译, 2016(4): 15-20.

[2] 张婧, 刘兵. 乔治·斯坦纳阐释翻译论视野下林戊荪译《孙子兵法》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语文建设, 2013(27): 43-44.

[3] 叶晗修. 从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看《聊斋志异》译者的主体性[J]. 语文建设, 2015(30): 91-92.

[4] 高晓鹏.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以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为例[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3(9): 27-31.

[5] 李楠. 从《丰乳肥臀》英译本看译者主体性: 以乔治·斯坦纳阐释运作理论为视角[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东南大学, 2016.

[6] 韩德英. 阐释学理论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葛浩文译本《生死疲劳》为例[J]. 吕梁学院学报, 2019, 9(3): 14-16.

[7] 周领顺, 周怡珂. 汉语“乡土语言”英译的“求真”与“务实”——基于葛浩文翻译实践的讨论[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21(6): 103-109.

[8] 曹芳.《生死疲劳》高密文化模因异国复制传播模式和效果研究[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1): 77-83.

[9] 刘云梦.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方言英译研究——以《蛙》葛浩文译本为例[J]. 英语广场, 2022(22): 32-34.

[10] 陈兆瑞, 阿力亚·艾尼. 体认翻译学视域下乡土语言英译认知解读——以葛浩文英译《蛙》为例[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7(3): 233-240.

[11] 邓园园. 关联理论翻译观视域下《生死疲劳》中的山东方言英译研究[J].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2, 40(1): 62-67.

[12]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21-26.

[13] 周领顺. “乡土语言”翻译及其批评研究[J]. 外语研究, 2016, 33(4): 77-82.

[14] 季进. 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6): 45-56.

[15] 孟祥春. Glocal Chimerican 葛浩文英译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38(4): 77-87.

[16] 莫言. 蛙[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17] Goldblatt, H. (2014) Frog. Penguin Group.